

# 老舍与张恨水叙述的北京的官僚与知识青年文化 - 清末民初至解放前

李在珉\*

## <目 次>

1. 绪 论
2. 官僚与北京
3. 知识青年与北京
4. 结 论

## 1. 绪 论

研究北京的文化，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如北京特有的风俗习惯、岁时节日研究等，我认为对北京的官僚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也是一个有效途径，因为这两者对北京特有的文化的形成有关进行做用。这篇文章限定的时期是新文化运动前后的清末民初至解放之前，因为这时期是结束几千年的封建王朝而要建立新的秩序的阶段，且新中国的政权还没有确立，是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给北京的叙述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舞台。在此北京研究的具体对象，笔者选择了两个北京叙述者，一个是京味文学的代表性作家老舍，另一个是现代文学作家当中销售量最大的张恨水。其目的之一是借助公认的两位“再现”北京的作者的作品探视当时的情况，但因为他们的文本不是历史记载文章而是小说、话剧，其文本只能起北京文化研究的补助作用。另一个更主要的目的是，

---

\* 북경대학교 박사과정

通过作为媒体的北京，探索两个作家的不同叙述态度与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以当时的北京为叙述背景的作品中，这两个作家的小说在数量与影响力方面都占最主要的位置，那么对他们的研究能具有作为地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地区文学研究的意义。尤其他们两个作家的出身的地域不同，即老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是代表老北京的作家，张恨水是安徽出身的，在北京文学立场来看是一个外地作家，这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的有效对照。

## 2. 官僚与北京

### (1) 官本位的城市

从明朝开始一直是皇帝统治全国的政治中心地的北京，到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也是各派军阀争夺的中心。1928年，北伐完成，北洋军阀在北京的统治被推翻，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该北京为北平特别市。北京暂时失去了中国首都的地位，但仍是国家北方的政治与军事重镇。九一八事变后，北京成了沦陷区，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一直处在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占领之下。这样的特殊环境给北京赋予了价值观上的“重官”倾向，政治不是遥远的、想象中存在的，而是与他们的人生发生密切关系的现实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形成了北京的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官本位是北京社会和人民心理的重要特征，人们羡慕官、崇拜官、怕官、恨官、想当官。官本位的观念是由官本位的现实决定的，即存在决定意识。中国封建政治的特点是治民，治民要通过官，官是封建权力的体现者和实施者。官本位的得以确立就是因为官在维护封建王朝上的重要作用，无官就无王朝，皇帝只要有官在手就可以实现统治。为了保证统治，官也就被给予极大的政治权利，加上官是现管，又可以为自己谋取私利，自然令人垂涎。对民来说，官是统治者，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里，当然是又怕又崇拜，甚至呼为父母，官也就变得无尚重要。官远远不仅是社会管理者，而是有一个社会的支配者。

## (2) 对官职的热望

在这样的“重官”的文化基础上，热望做官的愿望在北京是和其他地方比最明显的特征，尤其常年居住于皇都的北京人来说，当官几乎是最荣耀的事情了，在老舍的作品里这种北京人对官职的强烈愿望一再现身。《二马》中无能的马则仁一生想做官，到了重商的英国还是不忘初衷，对经商既不专心也看不起，认为做官最好，当商人弄钱是没出息，是俗气，对他来说，人活着作荣耀的还是做官。《离婚》中老舍描写的典型的北京人张大哥也是“上衙门的”，他对儿子的希望也是：“能下得去，有模有样的，有一官半职的”而不是别的职业的。《我这一辈子》的主人公是处于北京社会的最下层的，但是他对当官的意识也是当官：“学手艺，一辈子逃不出手艺人生，即使能大发财源也高不过大官儿不是。”《四世同堂》中的冠家和祁瑞丰是几乎可以说迷惑于当官的，而且这些人“除了作官儿，他们什么也不会，‘官’便是他们的生命，从谁手中得官，他们便无暇考虑，也不便考虑”。他觉得“别的都是假的，科长才是真调货！”最后卖国当官也认为是人生的成功。甚至他们对做官的欲望是超过对国家民族的最基本的责任感的，祁瑞丰“实在不愿意日本人离开北平，因为只有北平在日本人手里，他才有再作科长的希望”。<sup>1)</sup> 在做官的机会面前家庭的关系也可以随时扔掉的，冠晓荷对日本人说：“你们给我个官儿作呢，就是把大赤包的骨头挖出来再鞭打一顿，我也不动心”。<sup>2)</sup> 祁老人在老舍的笔下虽然不是以卖国贼的形象出现，但他也是毫无原则地看待子弟当汉奸的，只要当了官就行，是一种对官的无意识的盲目追求状态。《赵子曰》中混学校的赵子曰、武端、莫大年等也想当官，他们掀起的每一场动乱，每一个动作都有着非常明确的战略目的。无论是武端的“抓人秘密”，赵子曰的出任家庭教师，参加女权发展会，甚至下海唱票，都是为了做官。如同欧阳天风在泄漏天机时对赵、武两人所言：“你们二位不是要作官吗？同时，你们两位不都是有名闹风潮的健将吗？卖瓜的吃喝瓜，卖枣儿的吃喝枣儿。同样，作学生的吃喝风潮，作官的吃喝卖国，你们自然明白这个，不必我多说。现在呢，你们的姓名

1) 老舍：《四世同堂》，收于《老舍文集》第5卷，第2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2) 老舍：《四世同堂》，收于《老舍文集》第6卷，第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登在报纸上了，你们的名誉算立下了，这叫作不用花钱的广告，这就是你们不再念书而要作官的表示！”<sup>3)</sup>

和别的很多国家一样，为了获得“支配者”的地位，在中国买官卖爵的现象成为普遍的事实，尤其在北京，因为与官距离更近，人们对当官的热望沸腾，这种恶习弥漫成风，而且当了官，他的身份就可以从买官者变为卖官者，形成一种钱与权的有效结合方式。《北京史》记载：“同治、光绪年间，清朝统治者的腐化贪污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开捐出卖官职的次数愈来愈多，捐额并且一再降价，以广招徕。一些容易搜招钱财的“肥缺”，则需用巨额金銀属托贿买”，“甚至主持考试取士的各省学差，也要行贿。如朱善祥简四川学政，费二万两，约定到任后交一万，任满交一万”<sup>4)</sup>这种情形倒民国时期，甚至到日本占领北京的时期还是延续，《四世同堂》的兰东阳和冠晓荷一听说有校长的缺，马上张口就问价钱说：“什么？校长有缺吗？花多少钱运动？”，还对端丰说：“你去办好啦，我出两千五百块钱！你从中吃多少，我不管，事情成了，我另给你三百元！今天我先交二千五，一个星期内我要接到委任令！”<sup>5)</sup>，在这方面的思维非常灵活，行动也很自然，是“官本位”与“钱本位”的有机结合。在老舍的长篇小说《文博士》里，“当代的状元”文博士，就是靠着入赘济南富商杨家，才“借着杨家的势力而能跳腾起来”，当了“明导会”的专员。自然，在这场为古典的仕途模式所左右的联姻中，我们又可以嗅到现代社会特有的买卖味与铜臭味。与古代状元不同的是，现代状元必须主动去卖身投靠，攀龙树凤，而决不是待价而沽，等王侯将相前来招婿。这就是“知识权势金钱”三者合一的中国现代新官僚制度的特征，而且最活跃的“交易中心”就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城市北京。《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是小学教师，但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对教育的热情，而更接近于小商贩。让自己的老婆一年到头只吃个半饱，办小学校，为图省钱不开窗不生炉子，总想主意揩学生、家长的便宜。他非常地省吃俭用，到处蹭别人的饭吃，计算着怎样又能省下一顿饭的开销，研究出来拿别人的儿女折债当妾而省钱买自己的妾

3) 老舍：《赵子曰》，收于《老舍文集》第1卷，第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4)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北京史》，第293页，北京出版社，1985年。

5) 老舍：《四世同堂》，收于《老舍文集》第5卷，第3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的绝技，更妙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要拉近与官途的距离，一举两得。他总认为光是经商没意思，用臭汗挣钱只不过是小生意。他的真正目标是进入政界当官，认为一当官不用下力气就什么都有了，“名利兼收了！”，这才是大生意，他最后真做了一省的教育长官。

盲目地追求当官的人物在张恨水的作品里也比比皆是，他们尽可能地用所有的办法来求官。如《京尘幻景录》的下层官吏王佐才为了当高一点的官，向李逢吉求情的场面真是可笑，甚至到了可怜的程度，他把自己的那颗尖小油腻的脑袋，在李逢吉合抑的拳头上碰好几次。《春明外史》有一个下了台的财政总长闵克玉，他在在职时经常用公款来自在地玩乐，尤其是迷惑于赌博，四五年的工夫，再赌场花掉了三四百万，而一个的官职上的敌手告状，闵克玉就被罢免了。后来他觉得不能化公款实在不方便，公府里也等着要款，决定为官复原职话一大笔钱来“运动”，这对来说是一个很划算的投资。《金粉世家》里金铨的儿子是靠父亲的地为当上外交部的职务的，但他不务正业，整天吃喝玩乐，花街柳巷闲逛这样时间长了就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议论。金铨知道以后，他为了装点样子，他就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给儿子的顶头上司曾次长，让他严加惩处。但是对曾次长来说，真开除了他的公子等于连把他自己都开除，因此巧施妙计，不但不开除或降其职位，反而连升几级，并盼望着自己也趁此机会升级。如果说老舍作品里出现买官求官主要是北京人之间发生的事，张恨水的作品里的这种关系经常在北京的老乡之间发生。《春明外史》的一个高等级军阀鲁大昌是其代表，作品里说到：

“他极肯顾同乡，只要是他夕县的人，他总得给你一点事干。于是当时有了一种童谣。乃是：‘会说少县话，就把洋刀挂。’据人调查，夕县的男子，没有官衔的，只有两种半人。一是鲁大昌的仇人，二是没有出世的，还剩下半种人，就是不会说话，或不会走路的小孩。因为小孩里面也有少数挂官衔的，所以叫做半种。”<sup>6)</sup>

和他同乡的朱营长也要“靠着夕县话，去把洋刀挂”，鲁大昌谋钱是靠强行派发公债，搜罗民脂民膏，一个月就能发行三千万的公债，钱财一点不缺，当时看到他就不可其他的条件，也没要“运动费”马上给了他一个团长的职务。作品的另外一个人

6) 张恨水：《春明外史》，第63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

物秦彦礼是一个军阀政府出纳处长的，他的本事只是擅长给他的同乡的“主子”洗脚，所以他谋得了一个处长的职位，但如果接到一个电话说“老师要洗脚”，他就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赶紧回到主子那里去完成自己的首要事务，这是能保住他的官职的重要事项。

### (3) 新“官场现形记”

通过种种渠道，辛辛苦苦当上了官以后，有些人是马上开始要把他们出力的结果捞回来。官员的丑恶根源于他们的行为受不到有效的节制，于是才胡作非为，不管是在封建时代还是在民国时期，都是如此。从社会结构来看“五四”以来的北平与中国，不能说和以前的情况没有变化，也有很多爱国爱民的真正的“清官”，但从最上层的“总统”、“国会”到最下层的如“自治会”、“女权发展会”等独处出现腐败现象，只不过是西方式的政治机构替代了皇帝的龙庭与旧官僚的衙门，简直是现代“官场现形记”的新卷。他们心中没有国家，没有人民，做官就是图利，能图利就是一切，为此能干出任何坏事。老舍在作品中除了《国家至上》中的赵县长，没有写过好官，涉及到官的地方都是讽刺的、咒骂的，老舍作品中的基层官拿着自己的一官半职展开腐败的翅膀。在各种各样的官僚的腐败现象，在张恨水的作品中是淋漓尽致的。从《春明外史》里面看到的是北京官场的全景图，在反映生活的真实性和广阔性而言，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当时被人认为是京城野史的小说。张恨水的作品里出现的北京官场是种种弊端的集中地，如《新斩鬼传》揭露了现代社会军阀、政客、商人、文士的种种丑恶面目，《京尘幻影录》描绘京城中达官贵人的、官场的种种丑态。《五子登科》的“五子”指的是“房子，车子，金子，女子，票子”，写的是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现象。《纸醉金迷》写的是政府发行黄金储蓄单，举国上下掀起了抢购黄金的浪潮，后来政府突然宣布，持有黄金储蓄单的，一律六折兑付黄金，许多市民为此倾家荡产的悲剧。而且有很多作品是根据真正的现实来写的，甚至其中有些人物的名字和处境与当时北京的实际情况很接近，读者经常是以了解腐败官吏的丑态当作

阅读目的。如，《荆棘山河》揭露的是北京官场、军界、政界的腐败，而且作品写得和实际的人和事非常逼真，甚至作品在《世界日报》发表后，就遭到了军阀张宗昌的腰斩。这种得作风一直称为是张恨水的特征，后来有的好事者，还做了一些考证，说作品的人物实际指的是当时的什么人物。如果说老舍用真实的地名让北京活起来了的话，张恨水把北京政界的人物活活地登场在小说上面了。《春明外史》有一个总长叫做范统，平时对自己的职务非常不认真，京城有饿死的人悲剧认为是每个时代都没法避免的现实。他在北京公馆里没有姨太太，但却花了一千块钱，赁了个妓女充当临时姨太太，去参加选美大会，认为这才是让他激动得一件事。作者起这个名字也是讽刺他的，“范统”就含有“饭桶”的意思。鲁大昌，他手下有几十万的兵马，管辖两个省的地盘，他钱来得方便花得也大方。他到了什么地方，别的什么事可不办，第一件就得叫条子，先弄些姑娘来闹一阵。若是没有姑娘玩，他觉得枯燥无味，无论什么事情，也办不好。他很喜欢在北京呆着，在北京有八大胡同，又是全国闻名的莺花之窟，玩起来显着更是便利。所以他一到北京公馆，马上就吩咐开八辆汽车去接姑娘。每次一合子工夫，莺莺燕燕，他的大客厅里，就挤满了一屋子人。鲁大昌的亲戚是和日本人合伙卖咖啡的，但他觉得业无所谓，说：“卖咖啡的我倒是不恨”。《金粉世家》也揭露了官场黑暗，如权钱交易、化公为私等等。在张恨水的笔下金铨在家里以民主、平等为持家的基础，但是利用公共的财产建立自己的财富、把公权当作私权等方面，也不是例外。金铨身为民国的国务总理，还兼任着一家银行的总裁，其实那银行成了他自家的买卖，使一种变种的钱权交易。其儿子金燕西办喜事，非常隆重、豪华，不过他动用的都是官府的东西。他带公府的乐队来演奏，让一整连全副武装的军人来充当助理司仪。警察厅是毛遂自荐，在金总理门前加四道岗，高兴地为了这典礼作维持秩序的工作，这是属于官府的，但在这里官产等于私产。

如果我们观察老舍与张恨水的作品里描写的官场，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即他们所涉及的社会等级的不同。老舍作品里的官场比较集中于中下层的基层，但张恨水涉及到的官僚式基本上属于上层，甚至到了国务总理了。张恨水小说的小说作风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为迎合市民的好奇心理设计的，不过，这种最高层次的北京的官场不是在张恨水笔下第一次出现。早在金中都时期，北京这块土地上就产出来了

反映宫廷生活与宫闱斗争的小说《焚椒录》。明朝以后，北京文坛上以宫闱宦族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迅速增加，有影响的如明代王达的《椒宫旧事》，李贤的《古穰杂录》，宋懋澄的《九籀集》、《九籀续集》中的稗类小说，朱国桢的《涌幢小品》，陆琛的《玉堂漫笔》，杨士聪的《玉堂荟记》，王崇简的《谈助》，李清의《寿机闲评》，梁维枢的《玉剑尊闻》，昭珪的《啸亭杂录》，查慎行的《人海记》，天花藏主人的《平山冷燕》、《玉娇梨》，随缘下土的《林兰香》等。这些小说作品均以京城高层阶级的生活为背景，有的反映宫廷内外的斗争，有的反映权臣贵族的生活，有的演绎才子佳人的故事。例如《寿机闲评》写明代太监魏忠贤由一个混迹江湖的无赖成为篡权乱政的大宦官的历史故事，《林兰香》通过京中一个大贵族家庭的兴衰与荣枯，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也塑造了上至皇帝、朝臣、贵族妇女等各类上层人物。<sup>7)</sup>著名的《红楼梦》所涉及的主要也是一个富贵繁华、钟鸣鼎食的封建上流社会的典型环境，而这一典型环境又主要是围绕着皇宫御苑、官邸王府展开的。这些围绕着皇家进行的叙述，首先是很有动人之处，因为皇城是很可能聚集全国最高等级的人才，他们的思维能力和对政治的包袱是超出一般人的，如果能获得深入地理解他们的机会，组织起来浓度高的小说是相对容易的事。另一方面，比较容易达成通俗的目的，因为故事的背景是让人眼花缭乱的皇宫、大宅，其本身就可以满足一般老百姓的窥视心理、代理欲望，加上高层阶级的斗争是充满刺激的，容易写成曲折丰富的故事。虽然时代变了，皇帝在野不存在了，但是北京还是具有可以代替皇帝的新的统治者，张恨水就抓住这种特征，让北京官场的故事成为帮助作品的可读性的有效工具。他写作的时代恰恰是因军阀混战等原因，北京处于极其复杂的状态，各种腐败也猖獗，更是适合于写出精彩的“官场现形记”，在摩登方面没有上海那么先锋，但是这样的北京的官场题材能够与上海比肩，甚至超越上海了。

#### (4)官本位文化对北京人的影响

这样的官本位文化，不只是给北京的知识分子有影响，并在北京人的日常生活中

7) 参见甘海岚、张丽航主编《京味文学散论》，第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也成了重要的组成因素。作为首都的北京是政治信息量大,也是众多社会矛盾的焦点,老百姓经历了更多的政治风雨。晚清维新志士提倡办报纸,京城首开风气。基于这些原因,北京人显得见多识广,关心时事政治。清末北京的茶馆酒肆中常见“大家三五成群,那里高谈阔论”的场景,尽管人们并不理解什么是“立宪”,仍是各抒己见,“不问老少咧,贤愚咧,全都说一说立宪咧”。<sup>8)</sup>老舍先生的《茶馆》所反映的社会巨变中的人生百态,表明北京人的命运直接同政治联系在一起。常二爷直言不讳地说:“大清国要完了”,这是北京人政治敏感性强,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个例子。不过,这样的地方特色还养育了北京人对外面的政治风云极其敏感、谨慎的态度,因此其茶馆各处贴着的“莫谈国事”的纸条不惹政祸的必备品。北平自古就是北方各少数民族通向中原各地的门户与兵家必争之地。自燕都蓟城以来的三千多年的书平历史中,异族入侵的血痕可以说是遍布了每垛城墙与每一片砖瓦,从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清到八国联军,无不在这片黄土攻城略地,奸淫烧杀。由于每次异族入侵,都几乎是征服者的暴力获胜与被征服者沦为奴隶结束,这在北平人心态的历史积因中大大强化了对掌权者的顺民性格与奴性特征。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四时同堂》里,当自己的重孙被一号的日本孩子欺辱后,祁老人想的还是:“在他看,他应当领着重孙子到一号去道歉。当八国联军攻入北平的时候,他正是个青年人,他看惯了连王公大臣,甚至于西太后与皇帝,都是不敢招惹外国人的。现在,日本人又攻入了北平,他以为今天的情理当和四十年前一个样!”<sup>9)</sup>

官本位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北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阻滞现代化的进程。人们将精力智慧都用于争官作,把技术、生产、商业都看得低贱,自然就难以发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作官,并非搞生产和商业,而权术、钻营等为官之道丝毫也无助于社会的实际进步。这种的官本位文化不只是应向了沉溺于北京的传统价值观的人群,身之出国留学会来得青年的身上也弥漫着“官本位”哲学。据统计,1917年已归国的留学生总不下5000人,其中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北京,如果看1916年当时在北京的1655名归国留学生的就业情况,其倾向时更佳明显的。(见表)<sup>10)</sup>

8) 《正宗爱国报》第五百期,1908年。

9) 《老舍文集》第五卷,第95-96页

政界	学界	报界	青年会	医界	军界	赋闲
1024	132	16	3	23	56	399

所有调查的对象当中，在从事于政界的，即当官的占人员全部的61.8%，在科学、技术方面从事的人是只有一类从医的人，不过其占的比率才1.3%。赋闲的比率就很大了，是仅次于当官的，比律是总体的24%，他们通过出国深造的知识只能等待着用武之地。生活在这种现实中的老舍，彻底否定了北京的官本位思想，主张把精力用于科技和实业。他笔下的正面人物都是学农、学工、经商的。《赵子曰》中的李景纯是学哲学的，但他否定了自己的选择：“我自恨的是我把几年的工夫费在哲学上，没用！”他认为有用的是财政，法律，商业等实用学问，他对武端说：

“应当盼望着将来的政府是给专门人才作事的机关，不是你作官拿薪水为职业的养老院。几时在财政部作事的明白什么是财政，在市政局的明白市政，几时中国才有希望。要是会作八股的理财，会讲《春秋》的管市政，我简直地说：就是菩萨，玉皇，耶稣，穆罕莫德，联盟来保佑中国，中国也好不了！”<sup>11)</sup>

赵子曰否定的是传统的官僚文化，提倡政府各个部门聘用有具体的专长的公务员，同时批判把当官看作铁饭碗的现实。老舍主张用现代的专门人才管理社会，他虽然在人格气节、操守等精神方面，非常认同传统的思考方式，否定空泛的古代文化，实用层次上完全采纳西方现代实用文化，尤其在北京弥漫着的是官本位文化，除非改革官场的不良传统，北京的文化的健全也是难以保证的。老舍还担心官本位文化对孩子们人格形成的危害，反对以古板的教条束缚他们的手脚，反对仕途经济的庸俗眼光对待儿童教育。在《家书一封》中，老舍嘱咐家人的话，充分反映了他的观点，他说孩子“只要身体强壮”，“吃得苦，受得累”，能自食其力就好。“我愿自己的子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不要紧逼他们读书习字；书呆子无机可腾达，有机会作官，则必贪污误国，甚为可怕”。他用

10) 参见吴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第317页，开明出版社，1997年。

11) 老舍：《赵子曰》，收于《老舍文集》第1卷，第38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二马》的理想人物的马威则说过：“作官，名士，该死！真本事是拿真知识换公道钱。”于此对话的是李子荣的声音：“中国人不把官迷打破，永远不会有出息”，他的关心主要在包括北京人的中国人总有一天很有出息的。

从城市的文化形态上看，帝都皇城是北京文化的标志性面孔。作为“行政和文化的象征”<sup>12)</sup>，中国正统文化的中心，传统文化的仕进之途所造成的“官本位”意识，几千年来集中积淀在这古老帝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使每个平头百姓都有了“一朝为官，满门皆贵”的幻想。而且，北京人“贵”为天子脚下之民，以示深处含有“无官也有三品”之荣誉感。传统社会的官本位文化因此更深入骨髓，成为京文化的主流。鲁迅当年说的“帝都多官……在京者近官”<sup>13)</sup>，人民文?出版社，1996.，还只是指那些游寓在京的文化人转眼就沾染了官派品性，世代居住京城的地道北京市民就更浓厚了。处在宗法伦理、皇城文化酿造的官本位为核心的礼俗文化制约下，传统规范的社会生活是由礼教秩序血缘准血缘的伦理关系与政治权利的结合支配的，礼俗性官本位文化充分渗透于市民的日常生活，已融入他们的血脉中。

对官场的黑暗、勾结、斗争表现的厌恶，老舍与张恨水是共同的。但是他们所画出来的作品里，一样的北京官场带有不同的特色。作为外地人的张恨水首先瞩目的是与其他地方城市不同的北京官场的特殊性即最高权力的集中。他用报人的活跃性与敏锐性，给读者们如实地展示了政治中心城市北京的官场，同时继承了北京地区文学描写政治最高层世界的文学传统，这是别的作家难以替代的特征。老舍对北京的官场也是持着极其批判的态度的。但是我们能发现，老北京人老舍观察北京官场的丑恶时的眼光不仅停留在现象本身，而是把它提升到文化批判的舞台上了。

### 3. 知识青年与北京

#### (1) 文化与教育的城市

明代以来，北京作为政治中心聚集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中很大部分的青年追求

12) 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9页。

13) 鲁迅：《“京派”与“海派”》，收于《鲁迅全集》第5卷，第4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的是仕途，参加科举自然是他们停留在北京的重要目的之一。在其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中，青年对北京的追求发生了新的目的接受新教育、新文化。因为北京的历史上的政治地位让北京成为教育与文化的中心，到了引入西方教育体系的时候也承担了重要角色，最早的一批西式学校在北京落地，是根据《北京条约》进入北京的教会学校，如如1862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开办的育英学校、1871年由美国长老会开办的崇实学校、1872年由美基督教卫理会开办的汇文学校等。到19世纪末，废科举、兴学校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应试举子“其数大减于常年”，在北京兴办的新式学校越来越多，成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中心。北京不但拥有全国最知名的学府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还有大批高等和专科学校。1924年北京共有专科以上学校44所，在校生17,238人，几乎占全国大专生总数的40%<sup>14)</sup>，这些学生中既有从外地来的又有北京土生土长的。

## (2) 过渡时代的彷徨者

尤其从北京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消息传播到全国各地，北京吸引了更多追求新思潮的青年群体，他们怀着接触新文化的梦想和革命的激情聚集到北京，北京宣武门外各省会馆成为舆论中心和活动基地。<sup>15)</sup> 张恨水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朝着新文化运动来京的。和他的所谓“鸳鸯蝴蝶派”身份不同，他在记录青年时期的文章里一再强调他对五四的热情，如“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起来了，南北青年都很激动。我们也很关心，就在报上办起周刊一类的东西”。并且，他在回忆自己在北京的初期时写道“民国八年，夏初，‘五四’运动发生了。当然，我受着很大的刺激”，“于是我一再的向社方请辞，要到北京去。”<sup>16)</sup> 他计划到北京接触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就是授予新教育的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没得到深造的机会。

14) 参见吴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第354-355页，开明出版社，1997年。

15) 参见方彪编著：《北京的茶馆会馆书院学堂》，第78-8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

16)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9、114页

在他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追随着新文化到北京来的种种外地学生的印记，尤其担任重要角色的知识青年的大部分是外地出身，如杨杏园、樊家树、周计春等。其中《春明外史》的主角杨杏园的身世处境和当时的张恨水有特别接近的一面，如杨杏园是安徽出身，在北京客居5年，住在会馆之中，终日为报社奔波等。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杨杏园就是张恨水写他自己的故事的。<sup>17)</sup>杏园也是为了接受新文化、新教育，自愿到北京来的，但是他身上的传统文化的色彩很浓。他自幼受旧文学的熏陶，尤其爱旧词章，看到冬青写的六朝小品就不觉失声道“好清丽的文字”，也经常把中国传统文学的根底看作是判断对方的文化水平的重要尺度。有时候用委婉的口气来说“新诗有很好的，我也爱看，不过我对这样东西是门外汉，看不懂罢了”，但也用确定的口气说自己是“学旧诗，填旧词的人”。甚至不难发现张恨水在小说中用主人公的话来批评新诗的水平不如旧诗词的，作品中做新诗的人经常是学问浅薄的人，如吴碧波、陶英臣等，杨杏园为了赚生活费教的纨绔子弟富家骏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富家骏自豪地把自己写的“散文诗”给杨杏园看，杨杏园本身性格很客气、讲究给别人面子，但是他对此“散文诗”的评价是“在词曲骈文上，抄写艳丽的句子下来，然后夹上两三句自做的”，还奉告富家骏“白话文里，万万不要把这些美丽的字眼嵌进去”<sup>18)</sup>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在北京组织各种文学团体鼓吹新文艺的知识青年，其实非常爱好旧体诗的现象还是很普遍，这是已经通过很多研究者证实的事实。这一点可以反映当时为了收到新文化的洗礼到北京来深造的很多知识青年，在观念上选择、鼓吹新文化，但实际上不能放弃在自己骨子里的传统文化，在双重的文化之间发生矛盾，这是在文化的过渡时代避免的一种必然。可以说当时的张恨水也是存在于这种过度时代双重价值观之间的青年，描述自己对五四的感觉时用“当然，我受着很大的刺激”来形容的一个人，对新、旧体诗的这种态度，看来也是矛盾。但有趣的是，和其他的新文学作家在自己的口号和实际的爱好上存在较大的距离不同，张恨水是一开始创作就非常公开地说出来了自己对新、旧体诗的立场，加上在小说创作的形式方面也选择了新文学的攻击对象章回小说。虽然张恨水在作品中不断地体现他对新文化的追

17) 参见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39页

18) 张恨水：《春明外史》，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5、216、431、539页

求，甚至有时候对北京的西方化的生活方式采取欣赏的态度，但是拒绝全盘的改变，他在双重文化当中取舍对自己合适的生活方式和文学形式，象杨杏园随着当时北京的流行慢慢习惯喝咖啡、看电影，但还是坚持填词一样。

但是，如果说把新旧文体、事物之间的冲突可以简单地“中体西用”来借觉的话，在价值观的选择上张恨水也表现出来自己的复杂的心情。杨杏园的身上体现的是性格是矛盾的，他既厌恶和不满于旧世界又不能也不愿迎合新潮流，既反封建又害怕革命，结果是在他自己选择的城市北京客死。清末民初开始，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期，和任何一个历史剧变期一样，必然产生一些站在历史夹缝之间彷徨的人群，尤其对知识分子来说，重新建构思想框架的问题相比其他人群要更为复杂，当时就出现了价值观的混乱状态。这些知识分子当中包括率先觉醒，但被强大封建势力战败、颓唐下来的<sup>19)</sup>，也有向往个性解放而又不肯冒险的<sup>20)</sup>，还有一些人是在浓厚的传统意识与新时代的思想中彷徨的，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为了接触新文化离开故乡到北京来的革命的志愿者身上。

除了杨杏园以外，张恨水小说中还可以发现北京的种种知识分子群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报社记者，如《斯人记》的梁寒山、《太平花》的李守白、《记者外传》的杨止波等；中学教师，如《落霞孤鹜》的江秋鹭；大学教授，如《天上人间》的周秀峰、《做霜花》里的唐子安等人；或是学生如《啼笑因缘》的樊家树等等。这些知识青年都很年轻，都是在北京受新教育的知识分子，但他们骨子里旧文人的影子还是很浓厚。《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是一个接受了一定的科学、民主、平等思想的较为新进的知识青年。他出身于江南中产阶级家庭，也向往着新文化到北京，接受了较多的五四新思想。他讨厌对升官发财的盲目追求，来京深造的目的是获得新的知识、追求真理，在人际关系上也向往平等、博爱的。作为一个抱有理想主义态度的五四青年，他对于下层人民的态度纯粹是五四式的，就是启蒙和拯救。樊家树送凤喜上学，就是出于这种的愿望，但是他的“启蒙”与“拯救”也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终于没有真正改变沈凤喜的人生，他的“启蒙”只有满足了沈凤喜的虚荣心，却在沈凤喜陶醉

---

19) 鲁迅小说《孤独者》、《在酒楼上》

20) 郁达夫笔下的于质夫

于物质与势力的泡沫的时候，碰到她的冷淡就采取消极的态度，灰心地离开她。

《美人恩》中的洪士毅，也是一个善良、诚实、好学的知识青年，但是他面对社会的种种现实时的态度只是事事忍让、委曲求全、孱弱柔懦。特别是在常小南因贪恋富有的物质生活而背弃他之后，洪士毅的这些性格弱点表现得格外突出。先是企图以自苦去挽回失去的爱情，后又出于感恩思想去巴结慈善会长的公子陈东海，但是最后反而把常小南诱入陈少爷的虎口之中。张恨水对他们的态度是以好感为基础的，他们以为人正直、洁身自好、风雅洒脱的形象出现，并且对同情下层人民的贫困与不幸。但是，他们虽不满于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却很少有实际的反抗行动，通常会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他们虽然身处于正在树立新的价值体系的北京、革命的北京，而且是通过非常自愿地选择的这样的北京，受到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影响，他们并不象叶绍均、茅盾笔下知识分子那样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加入到现实中的革命中去。

处于文化转型、再造这样一个异常艰难的时代，生活在文化中心北京的知识分子的心灵苦闷同样也是老舍作品的主题之一。和张恨水的作品里出现的知识青年几乎都是外地出身的情况比，老舍写出来的知识青年的形象当中可以找到很多北京土生土长的，他们生存于一伸手就能接触到新文化的革命热潮的北京。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比较自然地了解了西方现代新思想，“对于新的事情与道理都明白个几成”。<sup>21)</sup>但是他们毕竟是脱胎于传统教育，不少人往往在行动上“站在自幼儿习惯下来的那一面”，只能充当“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sup>22)</sup>，在人生价值与现实情况中彷徨。这类人物里的典型例子是瑞宣，他是个大学毕业的中学英语教师，“对中国与欧西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sup>23)</sup>。在结婚时，他早已知道“恋爱神圣”、“结婚自由”，但因不能让祖父、父母失望，无奈地接受了家庭包办的妻子韵梅。北平沦陷后，他以自己具备的现代公民意识，知道自己的责任是“奔卦国难，决不后人”，可是传统教育的影响又使他留在北京照顾家庭。他在思想上有极清醒的认识，心里沸腾着热血，但在行动上却总是依照旧文化的传统的模式。而每次看到思想与实践发生矛盾

21) 老舍：《和容何许人也》，收于《老舍文集》第14卷，第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22) 同上

23) 老舍：《四世同堂》，《惶惑》，收于《老舍文集》第4卷，第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自己，不断地忏悔、苦闷，“管自己叫作会思想的废物”。如果说在北京弥漫的新思想是让瑞宣往改革的方向走的一个力量，那么与它形成张力的是以祁老人为代表的北京老百姓特有的对动乱的冷淡，革命、争权、侵略者都是对他们来说是司空见惯的。祁老人“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在他的壮年，他亲眼看见八国联军怎样攻进北京城。后来，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怎样退位，和接续不断的内战；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战争没有吓倒他，和平使他高兴。逢节他要过节，遇年他要祭祖，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只求消消停停的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即使赶上兵荒马乱，他也自有办法：最值得说的是他的家里老存着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这样，即使炮弹在空中飞，兵在街上乱跑，他也会关上大门，再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便足以消灾避难”<sup>24)</sup>

如果张恨水笔下的外地青年的思想自由和老舍的北京青年比较的话，还是张恨水的宽大一些。经常成为青年的革命思想的对立面的是父辈的旧思想，但是同意自己的子女到革命的核心地北京来的父辈对革命的反感少的可能性较大，并且，不管是否通过家庭的同意来京，物理的条件上，他们远离故乡的家庭，青年们受到的直接的、间接的干扰会自然少些。但是与一家老少住在一起的或经常接触的北京本土的知识青年，就是要处于离不开故乡的象觉新似的状态，不过他们毕竟是在闭眼睛睁眼睛都要看到革命的口号的北京，其新旧之间的痛苦是更严重的。

### (3) “五四”与假革命者

身处于“五四”核心地的老舍在他的作品中也画出了具有革命思想的、爱国的青年形象，如《鼓书艺人》的孟良、《赵子曰》的李景纯等。孟良是进步的作家和文化人，同时也是思想倾向相当明朗的民主战士。他与艺人方宝庆交朋友，无偿地为他填写新鼓词，还鼓励他和秀莲拥有艺人自我意识。他很明确地说：

24)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4卷，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我是个剧作家，我的责任就是要提出新的理想，新的看法，新的办法，新的道理”，他也反对北京人以当官为最荣的传统思想，说“我要愿意，满可以当官去，有钱有势。我不敢，我不要他们的臭钱。我要的是说话的自由”。

住在公寓的外地学生李景纯是具有平等思想、超过男女之别无私地帮助王灵石、勇敢地刺杀军阀的，也是老舍作品中的正面形象。他鼓吹革命、勉励同学参加革命，对革命也有很明确的自我把握，他说：

“打算做革命事业是由各方面做起。学银行的学好之后，便能从经济方面改良社会，学商业的有了专门知识便能在商界运用革命的理想。同样，教书的，开工厂的，和作其他的一切事业的，人人有充分的知识，破出命死干，然后才有真革命出现。各人走的路不同，而目的是一样，是改良社会，是教导国民，国民觉醒了，便是革命成功的那一天。设若指着吹气冒烟，脑子里空空如也，而一个使劲说革命，那和小叫娘想到运动会赛跑一样，无望，梦想！”

老舍对这些由革命思想的青年的态度是肯定的。那么，是否老舍是一味地接受“五四”，非常“感谢五四”呢？可能他对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有所赞同甚至欣赏，但在北京看到的所谓“革命青年”还是又反感的，好像他是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但在教会看到的牧师又反感的一样。李景纯是一个老舍早期作品中难以找到的正面知识青年形象，他的行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北京的革命家接近，但要注意的是他的思想里饱含着的浓厚的现实意识和改良主义。虽然他最后采取的是很极端的方法刺杀，但不能以这种选择把他看成是激进革命青年，因为在老舍的作品中刺杀不是革命青年的专利，《离婚》的劳动人民丁二对恶人的处理也是刺杀，《老张的哲学》的王德试图刺杀老张也很难看成是革命性行为，对他来说刺杀也是一种从现实的立场出发的方式，讨厌“一个劲说革命”、呼唤空虚的口号的革命的、务实的李景纯的选择。孟良也是一样，不管他的行动最终是否或地成功，他是实干的革命实践者。老舍的这种态度在《离婚》中也以一种反讽的语调出现：“普通人所关心的之所能应用的知识与经验，比苏格拉底一辈子所讨论的都有意思得多”。

其实他的这种态度，与当时老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有很接近的地方。如果说张恨水是看到“五四”，“受着很大的刺激”，从故乡辞职而来的热血青年的

话，老舍是在北京坐着接触新文化运动的。以前不少学者把1957年写的下面的文章当作说明老舍对“五四”的热情的根据：

“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敬敬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sup>25)</sup>

但是，这篇文章和两年后1959年写的另一篇文章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我们因不关心政治，便只知恨恶反动势力，而看不明白革命运动”，“在革命时代里我们犯了错误只有些爱国心，而不认识革命道路。”<sup>26)</sup>

实际，这在他写于1934年的文章中表现过当时他对革命的反感情绪：

“我的脾气是与家境有关的。因为穷，我很孤高，特别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一个孤高的人或者爱独自深思而每每引起悲观。自十七八到二十五，我是个悲观者。我不喜欢跟着大家走，大家所走的路似乎不永远高明，可是不许人说这个路不高明，我只好冷笑。”<sup>27)</sup>

老舍是1899年出生的，那么他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正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的前后几年。在此文章里他接着很明确地说自己当时与“五四”没有关系，写作的动机也不是因为在北京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

“五四运动，我并没有在里面。那时候我已作事。”，“二十七岁，我到英国去。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的念小说，拿它作英文的课本。年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时常想家，也自然想起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写写呢？”

他的意思是虽然身处于五四的中心地北京，但他还是不在“五四”运动之中，而且说是“那时候我已作事”，不像青年学生那样上街游行、鼓吹口号，而去干实际的工作。

虽然不能确定地说到底前后写的老舍对“五四”的态度为何不同，但是在他写的

25) 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文集》第14卷，第345-3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26) 老舍：《悼念罗常培先生》，《老舍文集》第14卷，第3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27) 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老舍文集》第15卷，第2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作品当中，不管是他在二十五岁前或者之后写的，知识青年的群像中以反面形象居多，理想的革命烈士少。作品中出现的最多的北京的青年形象是虚伪的、假装有思想的，他们不理解革命的真正意义，只是以一种凑热闹的心态去参与其中，成为假革命者。《赵子曰》的主要背景的天台公寓是这种假革命者的集中居住地，作为名正大学的学生，不好好上课，瞎闹革命，住在其中的“金銮殿”的赵子曰是代表。他愿意赶上时髦，也有虚荣心，上北京有名的洋行、老子号去买服装、饰物，以此为荣，“他的皮袍，从‘霜降’穿过‘五七国耻纪念日’，半尺来长的雪白麦穗，地道西口老羊皮。他的皮鞋，绝对新式，英国皮，日本作的，冬冷夏热，，臭闻远近的牛皮鞋。”，“他不要文凭，学位；有时候可也说：‘咱若是要学位的时候，不要哲学博士，不要文学博士；咱要是界第一，无所不有的总博士’<sup>28)</sup> 平时在公寓里吃喝玩乐的赵子曰也愿意赶上时髦，要“革命”，要参加学生运动，采取的方式则是好好地打一顿教授，要当一个假革命者。老舍在学生公寓里住过，熟悉住在那里的各种类型的学生，他“极同情于学生们的热烈与活动”，同时也在“严重而混乱的场面中”感到彷徨。<sup>29)</sup> 20年代的北京，多数大学校园的气氛确实是不平静的，“五四”运动唤醒和培育了青年学生的自我意识，在纷乱的时世中他们认为是民族国家的希望。学生们已经不再驯服地顺从教师和管理者的权威，不满的情绪在增长，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的。<sup>30)</sup> 这种情绪在“五四”运动以后迅速转化为罢课、抗议和游行示威活动等实际行动。其中一些学生确实是为了改革当时教育界的腐败、荒谬的状态，甘冒生命危险参加革命的，但是同时也有很多青年是以凑热闹、赶时髦的心态参加的。另一个假革命者的形象是《离婚》中的马克同，作为北京人他也受到了大学教育。他自称是马克思的弟弟，把所有的人叫做同志，其原则还适用于自己的母亲马奶奶，开口就说革命，表扬自己新思想精通，但在别人的心目中他只是一个流氓，丁二总想着揍他一顿。和他同居的女人高同志是拿别人的东西就吃，被阻止还要吗人家是小布尔乔亚，说是那个人不懂共产主义。

28) 老舍：《赵子曰》，《老舍文集》第1卷，第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29) 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文集》第15卷，第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30)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19~13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

从老舍和张恨水的作品来看，在对待这类假革命者的态度上他们是有共同点的。在张恨水的作品《现代青年》的后半部，也出现了虚伪的青年形象一位新文学作家余何恐。余何恐标榜自己是个平民化作家，致力于平民文学的创作。有钱的时候，他与一班以现代青年自诩的青年男女在一起吃吃喝喝，高谈阔论，谈理想，谈一元论、二元论。没有钱的时候，就当家具，饿肚子，编剧本卖钱。他想编一本三幕剧，题目是《牛》，“想在这篇剧本里，把农村经济崩溃的核心来把握住”，但实际上，正像他的画家朋友所画的牛，把绳子缚在牛角根上一样，他对农村生活也是一无所知的。他写了一个两幕剧《乡下人》，是暴露资本家丑态的，本已准备上演，却在遭到他的后台老板银行经理的反对后立刻主动地取消演出计划。张恨水以调侃的笔调和漫画化的手法给新文学作家画像，虽未免有点过于刻薄，但也确实指出了某些存在罗曼谛克倾向的新文学作家脱离实际、空喊口号、行言不一的弱点。《过渡时代》的另一个人物阉不古，以“现代青年”自居，张口“铲除封建思想”，闭口“打倒资产阶级”，然而透过他的一言一行可以看出，他只是一个十足的拜金主义者。

#### (4)对西方化的不同态度

虽然好多研究者的文章中，北京是“乡土中国”的象征，解放前北京的西方化程度远不如上海、天津、哈尔滨等有代表性的开放城市，但当时在整个中国的城市之中，北京还是相当接受西方文化的。对这种的新型事物最敏感的阶层还是青年知识分子，老舍的笔下也出现的一大群。在《离婚》、《牛天赐传》、《文博士》、《牺牲》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一味求新或完全西化而丧失人格甚至国格的堕落者一再现身，其中有兰小山、丁约翰、张天真、文博士和祁瑞丰等人物。《离婚》中的张天真“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老舍曾在英国生活过六年之久，对真正的英国文化有着自己深切而独到的见解，他能够用自己的准则与尺度来衡量那些表面维新、骨子里其实什么也不懂的“洋派人物”。在北京出现的“洋派青

年”是老舍笔下被嘲笑的阶层，他们总被叙述成思想浅薄，“自私自利而好摹仿的猴子”似的人物。《牺牲》留美归国的毛博士，衣着必“全份武装”地穿洋服，“手绢是在胸袋里掖着，领带上别着个针，表链在背心的下部横着，皮鞋尖擦得很亮”<sup>31)</sup>，房里摆的都是美国货，除了他无法改变的黄皮肤黑眼珠外，没有一点儿中国味。他崇尚西方的物质享受，见到别人就说：“美国家家有澡盆，美国的旅馆间间房子有澡盆！要洗，哗放水：凉的热的随意对；要换一盆，哗把陈水放了，重新换一盆，哗”，好像是认为越炫耀西方，自己的档次也跟着上升。老舍对他的评价是：“像个半生不熟的什么东西，不完全像中国人，也不完全像外国人。他好像是没有根”的浮躁人物。如果说上面一类的人物是停留在崇洋媚外的层次，长篇小说《选民》（又名《文博士》）的主人公文志强则是另一类型的留学生的代表。他在美国留学五年，混了个“哲学博士”学位。从国外回来，他已经没有民族自尊心，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破坏也不伤心，后来利用唐先生提供的“情报”，找到了向上爬的道路。短篇小说《东西》中，东洋留学生鹿书香和西洋留学生郝凤鸣则都是不考虑国家民族的利益，一心想发国难财的无耻之徒。

事实上，出洋留学是当时青年学子最为想往，最为时髦的事情之一，有的梦想成真，有的没能实现，其中也包括老舍与张恨水等当时从事于创作的好多作家。晚清外务部奏定《贵胄游学章程》，决定从王公贵戚中选取子弟送往国外留学，民国后虽然这种为特权阶级服务的留学制度被废除，但除了特殊的优秀学生能够通过获得奖学金之类的机会出国深造以外，从北京直接走上留学的路的青年不少，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也培养过要留学的许多人才。

如果说老舍对留学青年的描写基本上是否定，张恨水则有所不同。《金粉世家》中的金铨是身上兼有现代意识与传统美德的偏于正面的人物。他早年留学德国，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善于接受新事物。他具有婚姻自主、人格平等的现代思想，是个开明人士，虽为一国总理，又是三世同堂人家族的家长，但不专制，不迂腐，没有门第等级观念，允许子女自由选择婚姻。在中秋家宴上，他甚至要“解放”仆人，要仆人与家人在一张桌上吃饭。但同时金铨又具有中国传统的好的一面，仁慈和善，

31) 老舍：《牺牲》，收于《老舍文集》第8卷，第17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自然可亲。虽然他身上也有人格上的矛盾，但张恨水他还是主要以肯宁的态度描述的人物。《啼笑因缘》的陶伯和，也是留学回来的，喜欢上北京饭店跳舞、去平安电影院看电影，但这不是为了外遇，总是陪着夫人，在外交部里职位不甚高，但是一个认真、谦虚的公务员。但同样的留学派人物，张恨水对每个人的评价是有分寸的，《过渡时代》里的胡当仁是东化大学西洋画系主任，这位“艺术家”表面上西装革履，道貌岸然，骨子里却卑劣绝顶，丑恶至极。

#### (5)在两个世代之间

老舍与张恨水笔下父辈与子辈的关系的描写也是值得注意的。“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存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口号，当时为了冲决儒家思想与封建礼教的思想禁锢，提出“打倒孔家店”等的口号也是有其历史必要性的。但是，把新与旧的矛盾有意无意地归结为父与子的矛盾，就未免有过于简单化。当时的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由于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也曾经深信“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因而“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在反封建潮流的激荡之下，当时出现的文学作品中，凡是写到父与子的矛盾的，几乎都是青年代表革命、进步，老年代表封建、落后。这种写法当然也有其反封建的意义，但当其变成一种思维公式，也就成为绝对化。实际上，鲁迅后来也已认识到了过去自己的观点有些偏颇，他说“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sup>32)</sup> 老舍与张恨水的作品也认识到了，同是在革命的源泉地北京的知识青年，既有精神上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

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老舍作品里新派与旧派人物碰撞的过程中，新派人物经常扮演一种不稳妥的、虚荣的角色，而老舍对站在他们的对立面的父辈老派人物的态度则是批判与同情掺杂在一起的。相比之下，张恨水的作品里父辈与青年的矛盾相对来说少一写，尤其父辈伤害青年的人生的场面更少。相反，我们在张恨水的作品里能发

32) 鲁迅：《鲁迅全集》第4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现对“现代青年”的鞭挞和对父辈的同情。小说《现代青年》中对慈爱的父亲周世良由于妻子早逝，一个人辛苦抚育独生儿子周计春成人。在他的梦想是让儿子接受高等教育，目的不是当一个高官的父亲，而是使儿子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然而，作为一个乡下的贫苦农民，每天的三餐也难以保证，但是为了儿子受教育，卖掉田产庄屋耕牛，进省城开豆腐店，后来听到儿子在北平纵情声色、无心向学，又把豆腐店盘掉，到北平寻找儿子。他到北平后，并没有见到儿子一面，最后流落街头，在贫病交加之中含恨死去。与周世良对照的是儿子计春的堕落。他本来在家乡安徽也曾被誉为乡里的孝子和神童，但到北平后，由于意志薄弱，经不起诱惑出入妓院舞场寻欢作乐，把升学深造一事完全忽视。在张恨水的笔下，父与子的矛盾格局与新文学作品里的模式相比完全颠倒过来了，父亲周世良是作者讴歌的正面形象，他勤劳、正直、慈爱，对儿子尽心尽责。儿子周计春则是作者批判的反面形象。他以“现代青年”自居，实际上却腐化、堕落，耽于享乐，不图上进。我认为张恨水就是要通过对这些现代青年群像的描绘，表达对新文化运动完全“反传统”的否定和对传统美德的肯定。这样的思考方式，我们在老舍那里也能发现。在《四世同堂》中，老舍明确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几块“真金”，这种“真金”就是“中国的文化的真实的力量”，虽然是“旧的”，然而却“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sup>33)</sup>。

老舍与张恨水并不否认“新”，但他们的“新”，是在“旧”的土壤中生发的嫩芽，是在“传统”的温床中培植的“现代”胚胎，而并非异质的移植。他们所欣赏的是那种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道德意识、审美趣味而又不失现代意识的温和的知识青年，尤其老舍强调的是把激情变成实际行动的务实性。两个作家本身也是身处于新旧文化之间的过渡时代人，有时候为自己的“两重人格”苦闷，但是从两个方向来的力量形成张力，恰恰成为了给我们提供丰富的北京的新兴知识分子形象的主要基础了。

33)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77页。

#### 4. 结 论

在作为中国政治的核心的北京，皇帝与官僚长期扮演了社会上的重要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京者”最渴望的也是当官了，在此基础上，老舍与张恨水对北京的官僚文化进行了叙述。当时兼职报社的张恨水取得高层官僚的信息有便利之处，以细致、逼真的笔触画出来了北京的新“官场现形记”，一边担任了北京政界的“野史”的角色，另一边继承了古代开始流传下来的北京地域文学特有的皇宫、高官的题材。相对来说，老舍人关注的是官本位文化对北京人的灵魂的影响，尤其是畸形地盼望升官的心理对人与经济的恶性影响。北京的政治性特征带来的另外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的聚集，但是这时期北京情况已经与王朝时代不同，知识分子来京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就是接受新文化。与其他新文学阵营的作家主要正面革命地叙述知识青年不同，老舍作品里的知识青年几乎是以反面形象出现，留学派是经常以荒谬的形象出现。甚至他们所接触的新事物也当成是虚荣的象征物。相对来说张恨随笔下的新事物是作者设定的正面人物也乐于接触的，留学派当中也有与传统配合出来的肯定的一面。但是两个作家对受新教育的青年的共同点是演武假革命者，他们是把新文化运动与革命活动看成是时髦的东西，一凑热闹的心态对待。另外一个共同点是，把老一辈没叙述成矛盾冲突中的加害者，也没写成封建恶习的象征，有时候还肯定了他们人格上的美好的面貌。这也是与当时的新文学阵营的主流作家不同的一个立场。他们从自己独特的立场出发，给北京地域文学的领域增添了许多宝贵的文学模式，同时也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叙述范围。当时，同时代的作家也写过有关知识分子的不少作品，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忽略了他们对革命的误读与扭曲现象，知识分子经常是热血的青年，他们所苦闷的是对民众的启蒙、国家的救亡等非常认真的问题。但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荒谬性与无知性也是确实存在的，这在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作品里也有所表现，但是在数量与深度方面，尤其对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北京方面的考察，本文研究的两个作家的贡献是突出的。并且，以下层人民的叙述者有名的老舍作品中，出现的经常是从老百姓的视角观察的知识分子的百态，这在一般以知识

分子的眼光观察老百姓的其他作家成为明显的对比，同时给我们提供扩大眼界的文本。官僚的腐败方面也是在现代文学领域的其他作家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一个素材，但是他们作品中官僚的形象比较模糊，而张恨水的作品中目睹的是政治中心的北京的最高层官僚们的种种面貌，有效地发挥了作为记者的自己的特征。北京的“重官”文化是几乎成为共识的话题，但是北京土生土长的老舍贴近其文化的核心，展开从知识分子到老百姓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特殊心态。这些成为了不仅是在文学上，而且在文化研究领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참고문헌》

- 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北岳文藝出版社，1993年  
參見張恨水《寫作生涯回憶》，北岳文藝出版社，1993年  
老舍《我的創作經驗》，《老舍文集》第15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魯迅《魯迅全集》第4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老舍《四世同堂》，《老舍文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蔣夢麟《西潮新潮》，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  
參見吳建雍等《北京城市生活史》，開明出版社，1997年。  
老舍《犧牲》，收于《老舍文集》第8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

#### 《국문제요》

명대 이후 줄곧 중국의 수도로서의 역할을 담당하였던 베이징에서 관료의 의미는 기타 지역의 그것에 비하여 훨씬 깊으며 또한 광범위한 영역에서의 영향력을 가진 것이었다. 또한 직간접적으로 정치에 관심을 가지고 모여들었던 지식인들 특히 지식청년 또한 베이징만이 조성할 수 있는 특수성을 가지고 있었다. 특히 만청 시기와 중화민국 초기에서 시작되어 중화인민공화국 설립 이전까지 이어지는 시기는 과거의 질서가 무너지고 새로운 체계가 확립되지 않은 일종의 춘추전국 시기와의도 같은 특수한 시기였다. 본 문장에서는 베이징을 재현했다는 평가를 받고 있는 라오서와 장헌수 두 작가가 베이징의 관료와 지식인 그리고 그 주변 인물들을 어떻게 서술했는지를 분석해보고, 이를 통해 베이징의 문화가 가지는 특성과 더 나아가 베이징이라는 도시가 이 두 작가의 서술에 어떻게 작용하고 있는지를 분석하고자 한다.

주제어 : 베이징, 라오서, 장헌수, 관본위, 지식청년